

襄阳樊城大型三国墓

出土文物

三國遺韻

襄阳市博物馆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

襄阳樊城大型三国墓

出土文物

三国遗韵

襄阳市博物馆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遗韵: 襄阳樊城大型三国墓出土文物 / 襄阳市博物馆,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03-049514-3

I. ①三… II. ①襄… ②襄… III. ①出土文物—介绍—襄阳市—三国时代
IV. ①K873.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2068号

责任编辑: 王光明 / 责任印制: 肖 兴
书籍设计: 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7月第 一 版 开本: 889×1194 1/16

2016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8 4/3

字数: 252 000

定价: 20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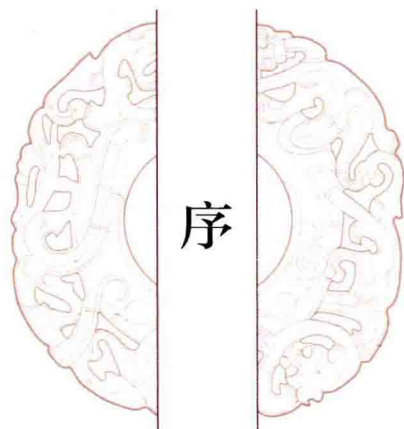


襄阳市博物馆专题展览图录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先福
副 主 任 王道文 范 平 张 靖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志刚 邓广锐 杨 力 张世海
陈庆荣 范文强 易泽林

《三国遗韵——襄阳樊城大型三国墓出土文物》
编辑组

主 编 张 靖
副 主 编 王智勇 汤雨林 刘江生
资料整理 侯桂芝 邓广锐 王巧玲 夏桂莲
陈晓飞 李 刚 龙 泉 王 倩
张昕源 陈 玄
摄 影 杨 力
审 稿 王先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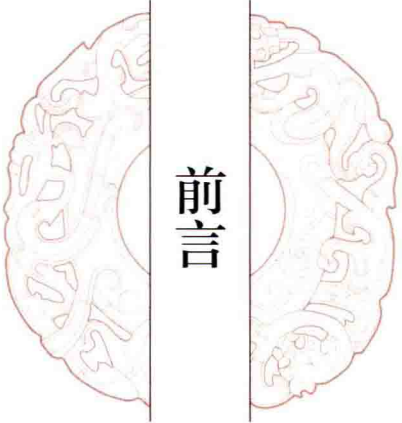


序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地处汉江中游，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要道，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地上地下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文化特色也较为鲜明。

历年来，襄阳市经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不同时代文物，这也成为襄阳市博物馆的重要藏品来源。截至2013年年底，襄阳市博物馆共收藏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各类文物藏品5万余件，其中经鉴定的珍贵文物5189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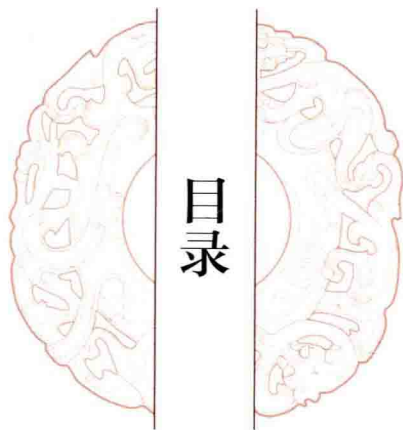
为较集中地展示襄阳市博物馆丰富的收藏和襄阳悠久的历史文化，襄阳市博物馆将逐步选取文物精品独立制作原创性专题展览，并同步编辑出版展览图录，《三国遗韵——襄阳樊城大型三国墓出土文物》即其中第一部。



前言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是襄阳历史最鼎盛的时期。东汉初平元年（190年），荆州刺史刘表将荆州治所由湖南汉寿迁至襄阳，在刘表的治理下，荆州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学术繁荣、社会稳定，吸引了大批文人学士到襄阳发展，使襄阳一度成为全国文化教育和学术中心，也奠定了襄阳“中国三国文化之乡”的历史地位。襄阳三国文化为海内外民众所熟知，“马跃檀溪”、“三顾茅庐”、“水淹七军”等三国故事家喻户晓，其代表人物就是被誉为“中国智圣”的诸葛亮。诸葛亮生于文化底蕴厚重的齐鲁大地，然遇乱世之秋，幼失双亲的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辗转流寓襄阳。建安二年（197年），诸葛亮在隆中躬耕苦读，广交士林，迅速成长为一名卓越的青年才俊。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进献“隆中对策”，为蜀汉政权提出了基本的建国方略。诸葛亮在襄阳“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境界中生活十年，为其成就丰功伟业奠定了深厚基础，也书写了他由俊杰到名相、由一介布衣到千古智圣的人生传奇。

与襄阳作为荆州首府的历史相印证，襄阳城区及周边陆续发现和发掘了包括刘表墓在内的多座三国时代的墓葬，其中2008年在襄阳樊城菜越社区发现的一座大型墓葬，为全国同时代墓葬所罕见。该墓保存完整，出土文物丰富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与艺术观赏价值，为研究襄阳三国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也展现了东汉末年诸葛亮躬耕襄阳时期的历史遗韵。



目录

序

前言

襄阳樊城大型三国墓的发现与发掘	刘江生	/ 001
刘表墓补证	叶植	/ 007
诸葛亮躬耕襄阳的历史背景	张靖	/ 012

出土文物图版

陶器	/ 023
瓷器	/ 051
青铜器	/ 055
铁器	/ 097
金银器	/ 105
玉、石、玛瑙、水晶、琥珀、玻璃器	/ 117
骨角器	/ 125
漆器	/ 129

襄阳樊城大型三国墓的发现与发掘

刘江生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8年10月，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建设路和长虹路交叉口之东南，抢救性发掘了一座三国时期的墓葬。墓葬所处位置隶属樊城区菜越居委会，遂编为樊城菜越M1。现将清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墓葬形制

此墓为土坑竖穴多室砖墓，方向 175° 。由斜坡墓道、墓坑和砖室等组成。

斜坡墓道位于墓坑南部，南段因压在建筑物下，未能发掘。平面呈长方形，已发掘部分长7.4米。墓道上口宽3.1~3.38米。墓道有二次使用的迹象，第二次使用时打破原墓道西壁的底部，开挖深度较原墓道略浅，原墓道下口宽2.86~3.36、现墓道下口宽3.04~3.36、原墓道较现墓道深0.1米。墓道内填灰黄色沙性土，夹有碎砖、瓦和陶、瓷器残片及铜管（络饰）、漆耳杯、铜钉等器物。

墓坑坑口长13.96、最宽5.6米。坑壁内收，壁面经过修整。坑内填灰黄色沙性土夹少量碎砖。

砖室由封门墙、石门、甬道、前室、过道、后室组成。砖室长13.14、最宽4.2米。

封门墙底部外弧，高2.8、宽2.6、下部厚0.37、上部厚0.18米。现封门墙的底部残存有一层第一次封门墙的底砖，第一次封门墙底砖也呈外弧状，外弧程度较现封门墙大。

封门墙内甬道口处设一道可供向外开合的两扇石门，石门通向甬道。门楣宽1.98、高0.39、厚0.28米，正面浮雕锯齿纹和菱形穿壁图案。门枋高1.73、宽0.33、厚0.28米，素面。两扇门均高1.43、宽0.66、厚0.09米，门槛宽1.98、高0.22、厚0.28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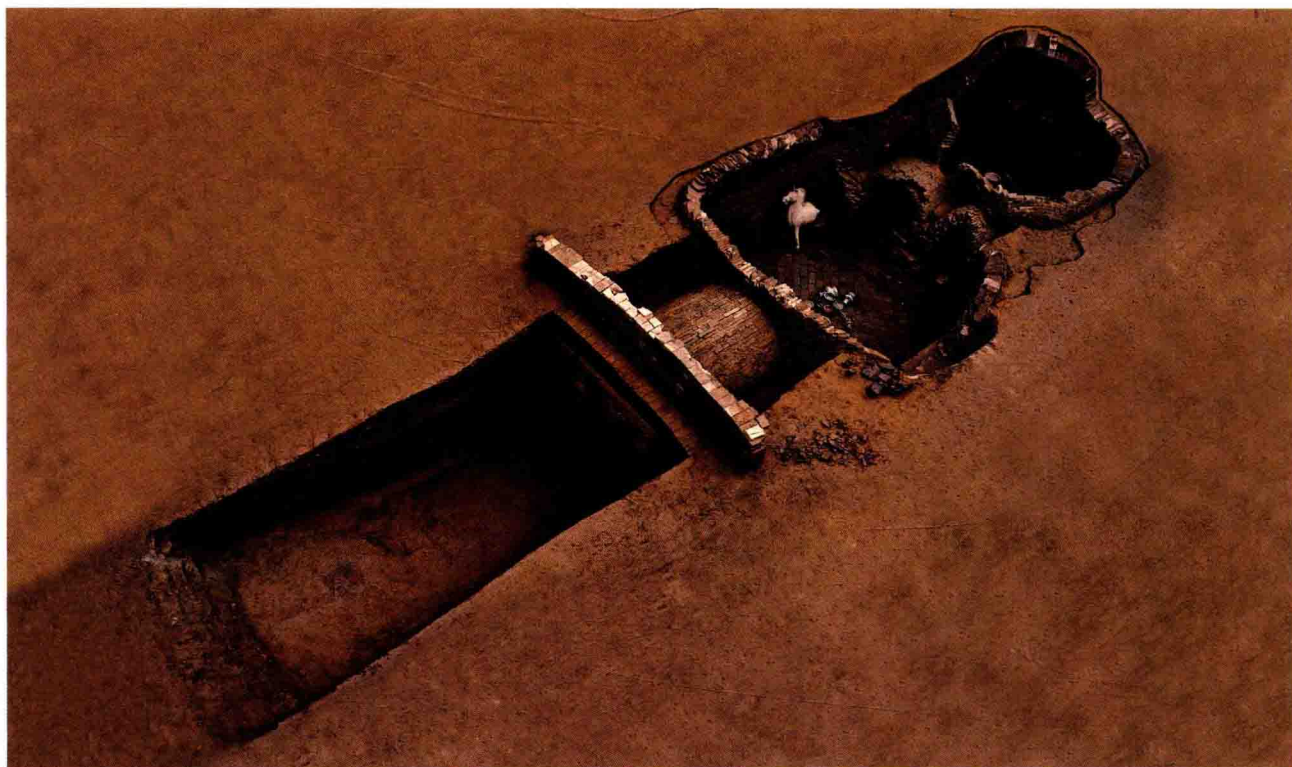
甬道长3.12、内宽1.8~2.05、内高2.06~2.18米，席纹铺地砖一层。甬道内南口紧贴石门处以单砖砌筑一加固券。

前室平面呈长方形，长4.58、宽4.2、残高2.84米。紧贴四壁以侧立砖横竖交错镶边，中部“人”字形铺地砖一层。在前室东西过道之间的壁面上涂有朱砂。

前、后室之间有两个过道，长1.78、内高1.7米，东过道内宽0.98、西过道内宽1.1米。

后室的平面呈梯形，长3.58、南宽3.12、北宽3.32、残高4.47米。

东西过道和后室以侧立砖横竖交错铺地，在靠西壁处以平砖围成一长方形棺床，长2.96、宽0.81米，在靠东壁处以平砖平铺一层作棺床，长3.02、宽1.48米。



墓葬全景（东南—西北）



封门墙（南—北）



石门（南—北）

墓砖有长方形、楔形。长方形砖用于砌壁，长 31 ~ 34.5、宽 16.5 ~ 18、厚 4.5 ~ 5.5 厘米。楔形砖用于起券，单长侧面模印有不同形状的几何纹饰，长 32 ~ 38、宽 15 ~ 17、厚 3.5 ~ 5 厘米。

从砖室墓高出墓葬开口的情况推测，墓葬原有较高大封土堆，从墓葬西侧的挖掘断面观察，为灰黄色沙性淤积土，无法区分出封土的范围。

墓室内填满淤积土，可大致分两层：第一层为灰黄色沙土，较细腻，分布于甬道、前室的上部和两过道、后室的全部；第二层为较纯净的细沙层，分布于甬道、前室内的下部。沙层的最厚处位于甬道东壁与前室的交接部，厚 0.8 米。

后室淤积土中发现木棺两具，南北向，东西并置，木棺已朽，存漆皮。棺的密封性和髹漆情况较好，因水的浮力和泥沙的沉积而逐渐抬高，两棺距基底 1.8 米。

东棺外壁先髹红漆，再髹黑漆，长 2.34、宽 0.66 ~ 0.74、残高 0.36 米。人骨朽，存头盖骨和人牙一颗及少量骨屑，从金手镯的位置和叠压情况判断，应是双手交叉放置于腹部（左臂压在右臂上）。西棺外壁髹红漆，长 3.12、宽 1、残高 0.42 米。人骨保存较完整，头向南，仰身直肢葬式。

二、随葬器物及分布

随葬器物共 206 件（套），质地有陶、瓷、铜、铁、金、银、铅锡、漆、玉、石、水晶玛瑙、骨、玻璃、琥珀等，另有铜钱 10000 余枚。

随葬器物分布于甬道、前室、东过道、西过道、后室。

甬道内出土器物共 21 件。

前室出土器物共 56 件，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出于淤积土中，计 12 件；第二部分均置于前室铺地砖上，计 44 件，大多位于中部。

东过道淤积土中出 1 件瓷罐。

西过道铺地砖上出土陶楼和漆器各 1 件。

后室出土器物共 126 件，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出土于淤积土中两棺内，计 90 件，其中东棺内出土 60 件，西棺内出土 30 件；第二部分出土于棺下部的淤积土中，计 11 件；第三部分出土于铺地砖和东棺床上，计 22 件；另有 2 件铁钩分别钉在后室的东壁上，1 件铜帽锈贴在后室北壁的东部。



甬道内出土器物（西—东）



前室中部铺地砖上出土器物（北—南）

三、结语

菜越三国墓是一座大型砖室墓，该墓规模较大，形制独特，随葬品种类多样，大多数保存完好，为研究三国时期墓葬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了三国时期的物质文化内涵。

1. 墓葬年代

此墓虽出土了永初二年（108年）纪年铜盘，但墓葬形制、结构和随葬器物却具有明显的东汉晚期或三国早期的特征。

M1的前室和后室均采用四隅券进砌法结顶，这种结构出现于三国时期，如在鄂城六朝墓中，四隅券进式穹隆顶墓见于孙吴前期（208～229年），这种结构在该地区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如与M1隔汉水相望的刘表墓即为此种结构^[1]。

随葬陶器的组合具有东汉晚期风格，但东汉晚期仍然使用的陶鼎已不见，陶壶接近洛阳烧沟六期或更晚的陶壶，陶猪圈、狗、镇墓兽、樽、灶等与该地区贾巷墓地M8所出同类器相似。施酱色釉、饰麻布纹的瓷罐，多见于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墓葬，与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所出瓷罐的风格相同。青瓷四系罐与四川大邑建安元年（196年）纪年墓出土的青瓷罐相似，但后者的釉有剥落现象，前者的胎釉结合紧密，前者与该地区老河口李楼西晋纪年墓出土的A型Ⅱ式青瓷罐更接近。漆奁与洛阳烧沟东汉晚期墓出土的同类器相同。铜钱以东汉“五铢”为多，王莽时期的“货泉”较少，还有东汉晚期至三国墓中常出的剪轮“五铢”、铤环“五铢”，部分“五铢”制作粗劣，钱体轻薄。

综上所述，我们初步判断 M1 的年代为三国早期。

2. 墓主身份

后室出土两具木棺，西棺内随葬有铁刀、剑和铜弩机，以及玉瑗、玉握、金饼、银饼等，东棺内随葬金手镯、银指环、水晶玛瑙串、铜熨斗等，据此初步判断西棺内是男主人，东棺内则是女主人。为夫妻合葬墓。正对西棺的西过道出有精美的陶楼，前室内出土有铜马和一件铜刀，这也进一步说明西棺内男主人应是一位高级武官。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蜜博士鉴定，西棺墓主为 45 岁左右的男性；东棺墓主已成年，具体死亡年龄不详。

M1 与武威雷台汉墓^[2]、亳县曹操宗族墓葬^[3]和刘表墓比较，少一个主室和耳室，但此墓室内建筑面积为 40.3 平方米，且出土了目前国内最大的铜马和其他精美器物，我们推测该墓应是较列侯一级略低的将军夫妇合葬墓。

3. 墓主下葬顺序

从墓道的打破和第一次使用的封门墙残留的遗迹判断，夫妇合葬墓是分两次下葬。东棺棺



后室东棺内出土器物（上一下）



后室西棺内出土器物（上一下）

床和东过道上层铺地砖相连，铺法相同，且位于同一平面上，应是一次性完成的。其下分别叠压有第一次下葬的铁条和玻璃珠。由此可以确定东棺是后葬入的——即女墓主晚于男墓主下葬。从两棺均浮于淤积土中，层位大致相同的情况推测，他们前后下葬的时间应相距不远。

4. 其他

连接前后室用两个过道，这种情况很少见。西、东过道分别为男、女墓主下葬时使用，西过道宽于东过道，体现了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女墓主单享一个过道用于下葬，说明其身前应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男墓主居西，女墓主居东，这与当时尊右的社会风尚相吻合。

该墓出土的陶楼体量较大，制作精美。整体造型结构承袭东汉的建筑风格。门、屋顶等部位装饰特殊。有关学者根据门上装饰的五个小羽人和楼顶上的七重轮盘等初步认定它是我国最早的佛寺——“浮屠祠”的模型。小羽人是佛教传入汉地后的“供养童子”造像。若此，则为研究当时的楼阁式建筑及佛教的传播与流行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铜熏炉（M1：2）造型别致，构思精妙，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于一体，四神与道教密不可分，圆形莲蓬纹与佛教有关。它是早期道教（本土文化）与早期佛教（外来文化）互相影响、融合的实物见证。

瑞兽形铜灯出土较少，在朝鲜乐浪和鄂城六朝墓中，分别称为砚滴、烛座。从使用功能方面考察，若为砚滴，其流在兽的背部，且管的直径较小，向器内灌水和向外倒水均不方便。若为烛座，没有烛钎，烛放何处，若将烛放在管内，烛则太细，很不实用。鉴于这些考虑，将瑞兽形铜灯内的残留物进行了提取，并交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秦颖教授做检测分析，结果红外谱显示油灯残留物含大量油脂成分。于是将其定名为铜灯，若此说不误，则此灯是以灯草或棉线之类的物质为灯芯，穿灯芯的铜管较细，灯芯与空气的接触面积较敞口油灯的小，灯油挥发少，应是当时的节能灯。同时，油在腹内，不易溢出，容易清洁。其造型生动，构思巧妙，不仅是一件实用器，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目前发现的几例均出自规格较高的墓葬中，且造型、大小基本相同，说明它在当时贵族中是比较流行的，很可能是由当时的工官作坊成批生产的。

铜马为我国出土的体积最大的青铜马。采用先分体铸造头颈、四肢，后铸造躯干时将头颈和四肢包铸成型的方法完成。为研究当时大型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提供了实物对象。

对墨、金属扣、玻璃珠、面脂和粉底的检测分析，还原了当时制墨、鎏金、熔炼玻璃的技法和化妆品的成分。对祭祀的动物骨骼进行检测分析，还原了当时用牲情况，为研究用牲礼制，特别是汉水流域该时期用牲礼制与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线索。

注 释

- [1]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城内三国时期的多室墓清理报告》，《江汉考古》1995年第3期。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城东街汉晋墓地发掘报告》，《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 [2]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 [3] 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第8期。

刘表墓补证

叶植 湖北文理学院

1994年襄樊市博物馆在襄阳城内东街发掘了一座东汉末至三国初年的大型砖室墓^[1]，在已发掘的明确为三国时期的砖室墓中，规模鲜有出其右者。报告作者认为，该墓是一座两千石左右官吏的高规格墓葬，并据《水经注》卷二八《沔水中》有“（襄阳）城东门门外二百步刘表墓”的记载认为该墓可能是刘表墓，但因该墓并不在今襄阳城东门门外二百步，而是在城的中心偏东位置，与《水经注》所载方位不合而不敢确定。作者虽提出刘表死后襄阳城可能有过变迁，但却没有给予必要的论证。试就这一问题补证如次。

一、刘表墓原本确实在襄阳城东门门外

《水经注》卷二八《沔水中》称：

（襄阳）城东门门外二百步刘表墓（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2]

知北魏后期襄阳城东门门外二百步的地面仍横亘着刘表高显整顿的坟冢及祠堂。刘表死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由其次子刘琮继位，同年九月曹操率大军攻荆州至新野时，刘琮即举州迎降。驻守樊城、措手不及、惊愕万分的刘备遂仓皇率众南奔，经过襄阳时，还匆匆拜谒了刘表墓，史载“备过辞表墓，遂泣涕而去”，“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3]。可知刘备呼喊刘琮时，就站在襄阳城东门门外刘表墓旁，仍在作争取刘琮抗曹的最后努力，刘备的喊话声城上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刘表墓被盗掘始载于《世语》：

表死后八十余年，至晋太康中，表冢见发，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闻数里。^[4]

郭颁，西晋时人，撰《魏晋世语》十卷、《群英论》一卷，前者多以《世语》称之，语晋魏世事多详核，曾任襄阳令，其载刘表墓被盗掘事自当可信。太康（280～289年）是晋武帝后

期年号，刘表墓当被发于太康末年的最后两年。

刘表墓前有高大的祠堂（庙）类建筑，建筑物前自然还应有不短的神道，神道两旁立有侍臣、瑞兽一类的石雕刻物。与刘表大致同时、襄阳城南十五里、汉水西岸上的蔡瑁墓前就立有高大的石刻。《水经注》卷二八《沔水中》载：“（蔡瑁）冢前刻石为大鹿，状甚大，头高九尺，制作甚工。”^[5]重要建筑前刻石鹿似为本地汉代风尚。东汉初年，襄阳侯习郁在苏岭山建纪念苏岭山神祠时，就在祠前建有神道，夹神道口刻二石鹿，耸峙似门，百姓谓之鹿门庙，久之，苏岭山也被称为了鹿门山^[6]。坐拥大荆州的刘表，当时“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7]，“不供职贡，多行僭伪，居处服用，遂乃郊祭天地，拟斥乘舆”^[8]。“命（杜夔）与孟曜为汉主合雅乐”^[9]。被大儒孔融斥之为“昏僭恶极，罪不容诛”^[10]。以西伯自处的刘表生活中早已僭礼越制，又借大荆州之富裕，刘表所营寿藏一定高大豪华，该墓圪因地下水位高而不深，主要依靠高大的地面封土覆盖，墓冢、神道及地面建筑占地长度当在百米左右，以至其封土和祠堂至北魏后期酈道元时“犹高显整顿”于襄阳城东门外。可证酈氏记载不虚。

现襄阳城（不含东北角子城）南北长约1600米，东西宽约1400米，笔者现场测该墓距东城墙500余米，南城墙约800米，大墓正位于襄阳城的中心位置略偏东处，与《水经注》所载城东门外二百步不合，这或许是报告作者不敢将该墓推定为刘表墓的根本原因。

二、历史上襄阳城曾多次向东挪动

襄阳城历史上向东多次挪动，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详论，现摘其要点论之。宋陈思《宝刻丛编》收录有《访碑录》唐贞元中（785～804）立《唐修刘景升庙记》石碑一通。碑文为唐德宗时人卢群撰，罗让书^[11]。卢群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至贞元六年（790年）以判官身份随江西节度、嗣曹王皋移镇襄阳^[12]，碑当立于此七年间。《宝刻丛编》还收录了欧阳修《集古录目》所收《唐新立镇南将军刘表庙碑》，为唐僖宗时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所立，容自称为表裔孙，在襄阳时常梦见这位远祖，故为其立庙。庙碑立于唐广明二年（881年），碑文为唐陵州（今四川仁寿）刺史刘权撰并书，碑阴刻有刘巨容所写的题记：

巨容既立庙，因于墓侧构水亭，为游宴之所，后记表僚属蒯越、韩嵩等，及蜀先主在荆州事迹，未有表所作《山道口亭铭》，刻在庙碑之阴。^[13]

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三收录该碑目录时称：

刘权撰，广升二年碑，巨容碑所立，在城中庙前。^[14]

唐无广升年号，当为广明二年之误。由此可知，酈道元后刘表墓前祠庙或已遭到损毁，唐代至少有过两次修葺，也说明至少唐德宗时刘表墓已从襄阳城东门外变到了襄阳城中。

秦汉以来，度制是一步六尺，一里三百步。酈道元生活在度量衡制急剧增长的北魏后期，

一尺长达 30.9 厘米^[15]，一步约为 1.854 米，以此推算，刘表墓当在当时的襄阳城东门外约 370 米处。考虑到酈道元本人并没有实际到过南方，其所用数据或引自于当时南方作者的著述，而当时南方尺度较北方要小得多，约 24.51 厘米，故实际距离可能要小于 370 米。由此可以确定，汉晋南北朝时期的襄阳城东城墙的位置当在刘表墓以西不到 370 米处。可证北魏后期至唐中期之间襄阳城已东移里许。

李廌《刘表庙》诗云：

入自东郭门，言拜景升墓。
墓树半枯槎，冥冥立晨雾。^[16]

李廌，北宋时人，《宋史》有传，与苏轼同时而幼于轼。他到襄阳城拜谒刘表墓，一入东廓门就看到了刘表的祠墓，周围的古树高大枯寂，墓前还有纪念性建筑——刘表庙（祠）。

《元丰九域志》卷一《京西南路·古迹》名单下列有刘表墓，但未指实^[17]。

庄绰撰《鸡肋编》卷上：

余尝守官襄阳，求岷山之碑，久已无见。……今州城在岷、万两山之间，刘景升墓在城中，盖非古所治也。^[18]

庄绰，字季裕，南北宋期间人。博物洽闻，尝摄襄阳尉，其间遍访襄阳文物古迹，记之甚详。这里，庄绰所看到的刘表墓就在襄阳城中，并明确提出当时的襄阳城“盖非古所治也”。所谓“盖非古所治也”明显是因为刘表墓已从《水经注》记载的襄阳城东门外跑到了当时的襄阳城东门内，故认定当时的襄阳城不可能是刘表当年的荆州治所所在。

李俊民撰《庄靖集》卷六《刘表祠》诗云：

天运端能卧可收，江山形势数荆州。
当时若听韩嵩策，那得曹瞒享士牛。

诗前自注：“祠前有墓，府城东门内”^[19]。

李俊民，字用章，泽州（今山西晋城）人。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 年）以经义举进士第一，后隐于嵩山，自号鹤鸣道人。元世祖以安车召见，还山不就。他对襄阳极为熟悉，写有几十篇咏怀襄阳古迹的诗。

由上述史料可知，唐、宋、元代襄阳城东城垣在刘表墓以东不远处。

乾隆《襄阳府志·陵墓》“汉荆州刺史刘表墓”条引述酈氏记载时称：

然考今墓所在，固非二百步也。里士郝瀚云：“康熙间其墓犹存。雍正二年，汉水大溢，墓为水所冲刷。”今仅存东面围墙数丈。^[20]

说明清初刘表墓至少地面部分封土和建筑物依然清晰可见,只是不在城的东门外二百步,《府志》虽未交代当时人们所见的刘表墓到底在城的何处,但似为城内人所周知,就在当时的襄阳城内某处,该墓清理时,亦有市民称此墓为刘表墓。

很明显,唐、宋、元时期刘表墓就在当时的襄阳城东门内不远处,而该墓现距襄阳城东门500余米,与庄绰、李俊民等所记不完全相合。

今按:这是明初襄阳城继续向东向南扩建造成的。唐、宋、元代的襄阳城只有九里。唐著名诗人襄阳孟浩然(689~740年)《与黄侍御北津泛舟》有“堤缘九里郭,山面百城楼”之句^[21]。白居易曾随父白季庚在襄阳居住多年^[22],其《再到襄阳访问旧居》亦云:

襄阳九里郭,楼堞连云树。^[23]

李曾伯《可斋杂藁》卷一九《奏襄樊经久五事》称:“襄阳一城,周围余九里,樊城亦近四里有半,夹汉而垒。”^[24]《襄阳守城录》记襄阳城周九里三百四十一步^[25],数据有可疑之处,三百四十一步已大于南宋一里,如是则襄阳城周乃十里有余,揣赵万年要表达的意思是,襄阳城廓较九里多得较多,但尚不盈十里之数。南宋里略小于唐里^[26],九里余正合唐里九里。

明初襄阳城向东向南扩了约400米。乾隆《襄阳府志·城池》载:

明取襄阳,以平章邓愈镇其地,于至正二十五年修之。拓东北角由旧城大北门外东绕今长门环属东城。凡周二千二百二十一丈七尺,得一十二里。^[27]

其他明清府县《志》所同。襄阳城此次向东向南扩了约400米才能使襄阳城增长三里,在城的东北面同时扩出了一子城以完善襄阳城东北角的防卫,即现在的新城湾,现襄阳城东城垣、南城垣内400米范围内少有明以前遗物,东城门内明以前地层为淤泥沙即是明证。历史上的襄阳城是不断由西向东迁移的,故邓愈这次扩建襄阳城无疑是向东向南进行的。刘表墓晋太康年间被盗贼所发^[28],也与发掘所见该墓被完全破坏、随葬品被洗劫一空相符。

综上所述,可证该墓确实是三国初荆州刺史刘表墓,三国时期在襄阳也只能是刘表才有这样的政治地位、胆量和气派,将自己高大的寿藏营建在当时的襄阳城东门外300余米大道北侧的显要位置上,至少到元初地面见到的刘表墓祠应与酈道元时所见到的无太大差异,清初仍显露在襄阳城内,地面封土及主要建筑物全部消失于清雍正二年(1721年)溃城而过的洪水,乾隆年间(1736~1796年)还剩下数丈城内居民所熟知的兆域或纪念性建筑围墙,是三国时期有明确记年、墓主身份清楚的又一座大墓,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